对王朝时代汉诗的讨论是本书的本体部分。

沿承着作者在第一编中表现的对日本汉诗史分期问题的关注，在第二编的起始部分，作者同样对日本学者的汉诗史分期作了回顾。其关注点在于，日本学者对发轫期的日本汉诗的研究，主要聚焦在平安时代。而作者将近江、奈良两朝与平安朝一同归为所谓的“王朝时代”，则是为了更完整地展现日本汉诗形成之初的样貌。作者对近江、奈良两朝的日本汉诗的创作概况及风格归纳如下：

近江朝，日本汉诗的创作者以大友、河岛、大津三皇子最为出众。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，抒情言志的作品质量较高（94）。

进入奈良朝，缙绅阶层成为日本汉诗的主力创作群体。而他们进行文学交流的空间，主要是在天皇的诗宴及外交场合。此时的作品也多是宴游之诗（98）。

此外，奈良朝，《怀风藻》的完成与传世，标志着发轫期的日本汉诗迎来了第一波的高峰。

总体来说，本书对奈良朝时期的宴游之诗评价不高，认为其“为文而造情”（98）。相反，本书对平安朝前期那些体现着“文章经国”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品较为认同（118）。评价平安朝后期汉诗总集《本朝丽藻》时，作者也强调日本汉诗人对汉诗讽喻和批判作用的忽视（272）。

对于王朝时代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，作者认为，日本汉诗人对于中国诗的热情是最主要的因素；而外交场合的赋诗，更被视为关乎民族形象的行动，因此促生了日本汉诗人对诗艺的琢磨（98）。

王朝时代日本汉诗的衰颓则是受到了多种方面的影响：

日中外交关系在官方层面的降温；本国贵族知识分子的探险意欲的失去；歌人的积极创作推动了和歌的复兴（103-111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提到，宽平、延喜时期，整个教育系统对汉文学的学习能力下降。（117）其中，从音读到训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尤为明显的，并且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